

2024 年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综述

贾中正^①

【内容提要】习近平外交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深入研究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深刻意涵和实践成效是学界面临的重大研究课题。本文梳理 2023 年国内外重要期刊中有关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研究成果发现，相关文章重点关注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发展与实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和平发展与国家安全等议题。这些研究认为，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两个结合”的具体体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核心理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为解决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中国智慧，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必然要求。这些研究成果对推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创新和发展具有显著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发展与实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推动全球治理 和平发展 国家安全

一、引言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乌克兰危机继续延宕引致国际政治格局突变、巴以冲突外溢效应引发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逆全球化风潮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步履蹒跚，复杂异常的内外环境令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对于这些困难与挑战，如何更好地运用习近平外交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相关理论，对国际重大现实问题进行跟踪、分析和研判，是摆在学界面前一项紧迫的重要课题。

习近平外交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伟大实践的深入推进不断丰富发展。2023 年，学界对习近平外交思想做了深入研究和阐释，进一步从学理角度分析认为，习近平外交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它不仅在指导中国外交实践方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而且对实现国际关系学从“国际关系学在中国”到“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转型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丰富内涵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其核心理念，是中国外交的总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努力目标，以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为实现路径，以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普遍遵循，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基本支撑，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战略引领，以高质量共建

^① 贾中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室，经济学博士、助理研究员，jjazz@cass.org.cn。

“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繁荣，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主张发展为科学体系的重要标志，厘清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一系列理念和倡议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深远历史意义，将展现出越来越强大的影响力、生命力、感召力。

本文基于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体系和重点领域，结合 2023 年在国内外权威或顶级期刊上刊发的研究成果，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的最新进展归纳述评。这些期刊主要包括《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中国工业经济》、《世界经济与政治》、《当代亚太》、《国际政治研究》、《国际政治科学》、《马克思主义研究》、*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等，从中选取的 61 篇研究成果主要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发展与实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和平发展与国家安全等领域进行学理性阐释或理论性构建，运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体系和架构来剖析和解决当今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中的重大问题。

从 2023 年国内外主要期刊研究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研究成果分布情况来看，《世界经济与政治》以 12 篇的数量稳居第一，约占刊发总数的 19.7%；其次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刊发了 7 篇，约占总数的 11.5%；《中国社会科学》和《国际政治研究》均刊发了 6 篇，约占总数的 9.8%。此外，《当代亚太》、《国际政治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等也刊发一定数量的相关研究。

从 2023 年国内外主要期刊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研究议题分布情况来看，有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研究成果最多，为 17 篇，占比 27.9%；其次是有关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发展与实践的研究，有 15 篇，占比 24.6%；再次是有关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研究，为 11 篇，占比 18.0%；第四是有关和平发展与国家安全的研究，有 10 篇，占比 16.4%；第五是有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有 8 篇，占比 13.1%。这些研究议题意义重大，研究范围较广，研究视角新颖，对推进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创新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发展与实践

习近平外交思想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伟大实践的深入推进而不断丰富发展。它作为“两个结合”的具体体现，为推进新时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注入了强大动力。一方面，这有助于国际关系学实现从“国际关系学在中国”到“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转型，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另一方面，充分彰显中国外交的特色和优势，对推动我国外交实践发挥重要引领作用。习近平外交思想将继续根植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历程，牢牢把握当今时代的发展潮流，不断研究和解决国际关系和我国对外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指导实践、推动实践中进一步展现出强大真理力量和独特思想魅力。

（一）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两个结合”具体体现

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外交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研究习近平外交思想必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原理和方法。欧阳向英（2023）^①认为，社会主义实践具有全面性和探索性，

^① 欧阳向英（2023）：“从国际共运和中共党史的角度阐释好习近平外交思想”，《东方学刊》，第 4 期，第 9-12 页。

习近平外交思想已具备体系化雏形。现实问题是不断变化的，习近平外交思想也在其中成长壮大。对习近平外交思想进行系统的研究、阐释甚至发展，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重中之重。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胸怀天下更是新时代中国必须坚持把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当代中国外交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具有浓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渊源，彰显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对当前中国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的贡献。赵思洋（2023）^①认为，天下思想经过近代中国学人的创造性转化，不仅适应了现代国际社会的发展要求，而且彰显出中国对外关系理念中一以贯之的人类共同体理想与大国担当。首先，在对中外历史与社会的比较研究中，通过阐释国际社会的历史演进逻辑，重构了“家-国-天下”的社会理论逻辑，实现了对天下思想的价值重估。其次，天下思想的内涵被创造性地转化为对公天下的责任观、和万邦的和平主义传统、定与通的心性政治以及对于“国际社会中人”的重视，从而为化解现代国际社会的危机、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提供了中国智慧。最后，经创造性转化的天下思想在近代中国参与国际组织与接受集体安全规范、联合弱小民族与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以及推动国际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等外交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此，重新发现天下思想对于深入挖掘天下思想的当代价值，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创新国际关系理论，反思现代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理论启示。

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推进新时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注入了强大动力。习近平外交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为新时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向引领、深厚的思想资源、坚实的理论基础。王镛（2023）^②认为，应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坚持运用唯物史观、坚持运用事物矛盾运动的观点、坚持运用实践第一的观点、坚持运用人民至上的观点，立足中国国情、把握时代脉搏，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际问题研究新路。坚持问题导向，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和平发展道路、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等新时代中国外交面对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坚持运用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开辟自己“解释世界、改变世界”的道路。

（二）对国际关系学的创新与发展

国际关系学若要实现从“国际关系学在中国”到“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转型，就必须找到学科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学术基础。解释现实问题、回应现实需求是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最强大的内生动力。鉴于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学科大厦的三方面建设资源（即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学术主体性、新中国的外交实践和中国的历史文化）业已成熟，据此，徐进（2023）^③提出以“一题五观”来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学科框架。“一题”是指一个核心研究主题，即一个崛起的中国如何处理其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五观”是指时代观、国家安全观、国际秩序观、全球治理观、国际关系建设观。“一题五观”框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浓厚的学术性和高度的集成性，基本涵盖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

^① 赵思洋（2023）：“因应国际社会——论近代中国天下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世界经济与政治》，第5期，第2-30页。

^② 王镛（2023）：“推进新时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第9期，第105-116页。

^③ 徐进（2023）：“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的内生动力、学术基础与学科框架”，《国际观察》，第2期，第22-40页。

主要领域，是对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创新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知识涵化是一种社会知识再生产理论，是一个以知识的多样性消解学术话语霸权，形成基于多元基础的共同知识的开放性过程。秦亚青（2023）^①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40 多年的发展过程更多地体现为一个知识涵化的过程，以开放性涵化起步，当前正处于双向涵化阶段，表现出比较明显的“中华性”。但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目的不是以“中华中心主义”取代西方中心主义，也不是以自文化产生的国际关系理论取代他文化理论，而是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全球化，向着建构人类共同知识的终极目标迈进。张清敏（2023）^②从外交、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等基本概念入手，认为三者具有不同的研究对象或侧重点，在研究设计中提出问题的角度和回答问题的路径也有所不同。厘清相关概念、研究设计及内部规律，在学理上有利于提高学科的专业化程度，增强研究者的专业意识，深化学科的研究程度；在实践上有利于纠正因缺乏专业知识而产生的关于外交的模糊认识，为中国外交营造健康和理性的国内舆论环境。

有学者从社会关系空间视角研究了全球史与国际关系及其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董欣洁（2023）^③认为，空间特别是社会关系空间既影响人类的生产和交往，又在人类的生产和交往中演变生发，是全球史和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范畴和重要研究内容。由于全球史与国际关系研究都注重横向交往，两者在空间上的融合如国家间交往形成的区域性跨国空间，正在凸显生产要素在人类交往中的基础作用，以及生产与交往作为人类社会两种基本动力的开拓能力。互联互通、互利合作、相互依存的全球空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中国全球史和国际关系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基础，是中国不断融入世界、不断为人类文明摆脱贫困消除压迫的进步事业作出积极贡献的现实进程，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群体交往和互动日益深入、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构建的现实进程。

有学者从方法论视角和中层理论层面对提升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水平进行了探讨。漆海霞（2023）^④认为，一项研究若只采用单一研究方法容易陷入方法缺陷，导致纰漏。为此，其建议采用混合方法对国际关系进行尝试，主要包括：采用形式模型经过逻辑推演提出假设，进而采用案例研究进行论证；采用博弈模型提出假设后，根据对样本的统计模型进行经验检验；通过案例比较发现研究假设，根据统计模型进行检验；在检验部分综合采用案例方法和统计模型，通过统计辨析变量间关系后再通过案例补充作用机制的细节。但同时也应注意，研究方法只是起辅助功能，思想才是文章的灵魂。也即，研究方法的作用是辅助发现并论证理论创新。因此，方法的前沿性和模型的复杂度不应成为评判国际关系研究质量的唯一标准。漆海霞（2023）^⑤还分析了中国在国际关系领域推动中层理论创新发展的可能性，一方面，中国的外交实践和古代经验为中层理论突破提供了新的思路来源。另一方面，中国国关学界的理论进步也可以为全球国关学界的整体进步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① 秦亚青（2023）：“知识涵化与社会知识再生产——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路径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第 1 期，第 3-24 页。

^② 张清敏（2023）：“外交、对外政策还是对外关系——论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学科困境”，《世界经济与政治》，第 5 期，第 31-52 页。

^③ 董欣洁（2023）：“全球史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空间融合”，《中国社会科学》，第 7 期，第 45-60 页。

^④ 漆海霞（2023）：“混合方法：当前国际关系研究的可行选择”，《国际政治科学》，第 1 期，第 III-VI 页。

^⑤ 漆海霞（2023）：“国关中层理论创新需受到我国学界重视”，《国际政治科学》，第 3 期，第 III-VI 页。

话语间的交锋与融合成为国际秩序演进的重要动力,也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资源。有学者从国际话语权的构建和塑造视角研究了中国国际关系的学科体系的建构问题。在国际话语演变中,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被设定为“失语”的被动接受者,而今他们的主动性与影响力大为上升,经常性地成为国际话语主动的塑造者。陈拯(2023)^①基于中华传统“势”的战略思维提出的“话语势能”框架,较好地把握外交争论的情境性,打破既有理论的一元线性范式,对其中各维度及环节的相互关联与作用进行动态和整体的认识与理解,进而系统探究政治主体“用势”和“造势”的能动实践,既揭示争论实践的一般性逻辑,又强调其中权变的情境性。如,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进入国际人权话语体系,就充分展示了“话语势能”构建在国际话语塑造中的关键作用。挖掘和阐释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与学科国际前沿进展相对接与整合,构建国家间互动新的分析框架,以“话语势能”的构建和运用为中心的争论策略研究将开辟理解中国等发展中大国与国际秩序互动的新视角,为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新思路。

还有学者从少数民族视角诠释了中国外交的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有其独特的逻辑和历史起点,往往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取要素作为创新点和突破点。中国的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然也包含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金磊(2023)^②把少数民族的思想和实践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少数民族在历史中的世界观、人口移动、性别角色和习惯法等方面的地方性知识,在结合国际关系实践并同既有理论比较的基础上,以中国古代外交史、跨境田野调查和全球史的少数民族视角诠释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这不仅可以摆脱又一个“中心论”对中国创建自身国际关系理论带来的一系列困扰,有助于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体系,也为分析和解释政治单元互动、地区秩序的维系和变迁以及中国外交能力建设提供一个新思路。

有学者批判了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必须回归中国的历史经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根本缺憾是以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代替了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尽管西方和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也做出诸多尝试,努力把当今世界不同国家的历史经验阐释出来,但均未能冲破“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的束缚,出发点还是要把非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整合”进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来,这种“削足适履”的努力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为此,中国国际关系的理论创新也将不得不回到中国历史经验的阐释中来。在全球史视域中,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为超越西方大国的兴衰逻辑提供了历史依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亦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注入不竭动力(刘德斌,2023^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拓展了传统意义上“国际”的内涵。从人类共同利益、共同命运的视角重新思考参与全球经济与政治事务的各种行为体,为构建一种涵盖范围更为广泛、更为贴近世界政治经济现实的国际关系理论奠定了基础。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只有建立在全球史研究的基础之上,拓宽观照范围,注重共同利益,解构零和逻辑,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作为国际关系理论演进方向,才能超越东西方“我者”与“他者”之间的鸿沟,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视域和境界,引领国际关系理论走向一个新的时代。

^① 陈拯(2023):“‘话语势能’构建与国际话语塑造”,《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第156-174页。

^② 金磊(2023):“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少数民族诠释视角:指向、基础和路径”,《国际政治研究》,第1期,第114-134页。

^③ 刘德斌(2023):“全球史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拓展”,《中国社会科学》,第7期,第30-44页。

（三）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有学者对中国大国外交的独特风范进行提炼，并从“文化软实力”视角提出了中国外交的特色和优势。徐进（2023）^①认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有以下鲜明特点：努力保持与主要大国关系的稳定；致力维护周边稳定合作大局；奋力拓展全球伙伴关系“朋友圈”；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办人民满意的外交。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外交变得更加主动、更加进取、更加自信、更加成熟，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升。张国祚（2023）^②认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立足中国国情，突出中国特色，已经形成了包括“八对范畴”和“十六个问题域”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后者包含了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文化软实力、中国国际交往的文化软实力、中国国家形象的文化软实力等，这不仅赋予“软实力”以鲜明的中国特色，而且从学理层面超出了西方国家关于“软实力”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有学者研究了全球南方与中国外交的新议程问题，以期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实践进行阐释。赵可金（2023）^③认为，中国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天然同盟军。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应积极探索新时代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正确相处之道。特别是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应确立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中和哲学，发展与全球南方的全球治理伙伴关系：一方面，必须突破国家主义的封闭阵营，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开放导向，坚持正确义利观的中和之道，在全球主义框架中谋划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价值；另一方面，中国还应在国家主义的框架中谋划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推动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共治理伙伴关系框架，致力于打造全球发展的建设者、全球安全的守卫者、全球文明的传承者，做负责任、敢担当的新型大国。总之，共赢共享是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关系的利益基础，开放中和是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关系的价值要义，命运与共是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关系的必由之路。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核心理念，是中国外交的总目标。它作为对现存共同体秩序的超越，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向全球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全球治理思维和治理理念，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开辟了新的愿景。唯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在全球范围内真正解决人类命运问题，才能打开通往“真正的共同体”的正确道路，它体现了中国为应对国际重大危机和全球性挑战贡献的中国智慧。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涵

世界变局历史地推动着文明形态变革，生产生活变革、世界政治调整、价值理想重塑、全球治理改革正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的未来叙事。项久雨（2023）^④认为，以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标志的思想体系塑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层精神结构。在世界变局的历史分界点上，超越以西方为中心的“普世文明”构想，超越具有对抗性质的文明冲突陷阱，解决世界性的风险社会难题，应以人类命运共

^① 徐进（2023）：“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相互成就”，《东方学刊》，第4期，第3-8页。

^② 张国祚（2023）：“中国文化软实力理论创新——兼析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思想”，《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第188-203页。

^③ 赵可金（2023）：“全球南方与中国外交的新议程”，《国际政治研究》，第6期，第92-111页。

^④ 项久雨（2023）：“世界变局中的文明形态变革及其未来图景”，《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第26-47页。

同体为世界历史载体，协力走向文明自觉的多元现代性图景、更高历史位阶的社会主义文明图景、美美与共的文明交往图景，最终绘就各文明共创人类美好生活的生活图景。李滨（2023）^①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基础上是一脉相承的，它将认同建立于因分工带来的共同利益增进这一物质基础之上。在生产水平相对不发达和各国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现阶段国际交往的具体实践，强调尊重不同社会制度和文明的多样性，探索不同制度和文明的和平共存之道，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追求所谓先验的绝对伦理认同，而是从客观生产力的角度出发，遵从责任伦理原则，把各民族发展境遇的改善立足于可能的范围内，强调在实践中通过合作、对话和协商等方式实现目标，实现了对中外世界主义共同体思想的超越。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世界各国人民价值追求上的“异中之同”，也是各国人民价值观念和思想认识上的“最大公约数”。王永贵（2023）^②从全人类共同价值话语的不同维度出发辨析其与西方国家所宣扬的“普世价值”的差异，打破“普世价值”织就的“理论幻觉”，并进一步从社会主义属性、治国理政和国际交流的丰富实践、大国大党的责任担当、中华文明的交流互鉴、全球治理的集体本位以及和平发展的共识凝聚等六大维度，全方位、多层次阐明全人类共同价值话语的深刻意蕴、鲜明特质及现实意义，全面彰显全人类共同价值话语的独特属性和叙事体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对现存共同体秩序的超越，向国际社会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全球治理思维和治理理念，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开辟了新的愿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贡献，是中国对国际秩序观的创新与发展，为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陈曙光（2023）^③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全球治理的形而上学思维，创新了全球治理的思维范式。它重拾被西方搁置的全球正义问题，旨在消解资本主义全球化所造成的中心-边缘结构和依附型世界体系，是具有原创性意义的国际秩序观。它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统治下的现代文明，创造了更高水准的人类新文明，成为中国在 21 世纪引领人类精神成长和世界历史走向的鲜明旗帜。它规避了两制生死博弈的终极逻辑，打开了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背景下两制和平共处、人类和谐共生的历史空间。它旨在遏阻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的历史逆流，重构世界普遍交往范式，匡正现时代国际社会的奋斗目标，是世界历史目前阶段的新纲领。总而言之，唯有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在全球范围内真正解决人类命运问题，才能打开通往“真正的共同体”的正确道路。

（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黄平（2023）^④从身份、视野以及价值等维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构建进行研究，并批驳了西方对中国发展的误读和偏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从真正的全球性关怀出发，以负责任大国的胸怀和担当，坚定不移地维护世界和平，和其他国家一起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积极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为合作、包容，更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变革。这一理念表明，中国对“和平

^① 李滨（2023）：“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基于中外世界主义共同体思想研究的比较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第 12 期，第 2-21 页。

^② 王永贵（2023）：“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话语特性和叙事体系”，《马克思主义研究》，第 8 期，第 1-9 页。

^③ 陈曙光（2023）：“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第 2 期，第 49-60 页。

^④ 黄平（2023）：“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大国成长：身份、视野、价值”，《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12 期，第 82-94 页。

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且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批判和超越，是要打破“国强必霸”的逻辑，实现和平发展。侯长坤（2023）^①研究总结了中国古代的天下主义战略文化，回答了“天下主义战略文化是什么”这一问题。天下主义的建构不仅有利于中国自身战略定位与走向的把握，对在和平崛起、成为主导力量等不同时期的战略制定有着重要指导作用，而且有利于国际社会加深对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解，这也将有利于稳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中国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应以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基本框架，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根本道路，以抵制西方“普世价值”论和“文明冲突”论为着力点。杨礼银（2023）^②认为，从实现机制上，建立担当有为的主体责任机制，确立先进政党领导、中国引领、世界各族人民积极参与的弘扬主体结构；建立畅通无阻的价值传播机制，铺设全面有效的弘扬传播网络；建立理性适当的话语沟通机制，促进弘扬话语的表达和理解；建立合理有效的社会认同机制，打通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最后“一公里”。另有学者从生态保护视角研究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发挥的指导作用。近数十年来，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掠夺生态资源、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污染、极力推卸应负的生态治理责任，以至于酿成全球性生态危机。如何重塑全球生态正义、实现“两个和解”是攸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李包庚（2023）^③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为重塑全球生态价值观、全球生态利益观和全球生态责任观，为实现全球生态正义与“两个和解”目标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

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是中国今后相当长时期对外开放和对外合作的管总规划。“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已在各领域取得丰硕的合作成果。从影响机制来看，“一带一路”对发展金融的规范和标准产生重大影响，由此形成的贸易合作网络显著促进了各国贸易出口。究其原因，“一带一路”是协商-实现-分配模式各环节有机衔接和协同推进的全过程合作体系，秉持正确义利观，打造了合作之路、健康之路、复苏之路、增长之路，实现了互利共赢。

（一）实践成效

张宇燕等（2023）^④研究发现，基于新发展机制的开放不断扩大，2008-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开放指数增长5%，而其他经济体的开放指数下降了7.1%。袁正清、董贺（2023）^⑤基于中国-东盟关系网络复合结构分析发现，中国-东盟关系在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均具备不同程度的比较优势，为双方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丰富的关系性资源。中国根据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需要积极开展合作，在互联互通、经贸投资、产能合作、绿色经济以及绿色转型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各国发展培育空间、创造机遇。

^① 侯长坤（2023）：“战略文化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天下主义”，《国际政治研究》，第5期，第110-135页。

^② 杨礼银（2023）：“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科学内涵、基本路径和实现机制”，《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1期，第75-84页。

^③ 李包庚（2023）：“走向生态正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研究》，第3期，第130-140页。

^④ 张宇燕等（2023）：“世界开放：韧性、新生与安全”，《国际经济评论》，第2期，第9-29页。

^⑤ 袁正清、董贺（2023）：“中国-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理念与实践——基于关系性合作的视角”，《当代亚太》，第5期，第25-34页。

有学者以经济走廊建设为切入点,分析了“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李向阳(2023)^①认为,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最重要的载体,它主要经历了狭义经济走廊、拓宽经济走廊、夯实经济走廊与广义经济走廊四个发展阶段,这种深化或升级实际上是构建区域供应链或价值链的过程。深化经济走廊建设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惠民生、高标准与可持续的内生要求,也是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必然选择。步入新的发展时期,深化经济走廊建设应协调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中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关系、硬联通与软联通的关系以及创造新的比较优势与开发利用现有比较优势的关系,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奠定微观基础。罗长远等(2023)^②研究发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与未参与的企业相比,金融化程度有所削弱,表现出“脱虚返实”的倾向。企业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走出去”提升了实体获利能力,抑制了金融化动机。李敬子等(2013)^③将供给侧和需求侧的风险波动纳入一个统一的贸易理论框架,探讨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产业链安全的构建路径。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够更好地分散中国的供给风险,尤其是农产品行业和矿产品行业的供给风险,但不能很好地分散中国的需求风险。“一带一路”倡议和畅通国内大循环对中国风险分散具有互补性,这有助于形成多层次的风险分散网络。在国内生育率降低和老龄化预期显现的背景下,中国应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充分利用沿线国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并与国内要素供给和产业链互补,有效分散供给侧风险。同时,利用国内市场潜力和需求规模,分散需求侧风险,构建多级多层次风险分散体系,有效管理供需风险。

有国外学者研究了“一带一路”共建对参与国的影响,包括经济可持续发展、减贫、国际创新合作等方面。Bharti(2023)^④研究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埃塞俄比亚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后发现,中国在非洲大陆推动 BRI 项目,为包括埃塞俄比亚在内的东部非洲国家提供了高级别投资机会。其中,在埃塞俄比亚成功地推动了交通系统、道路、铁路、小工业、汽车行业和卫生发展等项目,为当地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提高社会经济地位。总之, BRI 的确对埃塞俄比亚的基础设施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同时也面临环境和人口迁移等挑战。该文的不足在于,其虽提及债务问题,但没深入探讨债务的可持续性及其对埃塞俄比亚经济的长期影响,且所用数据和资料存在滞后,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可信度。Xie 等(2023)^⑤采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对“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减贫的影响研究后发现,加入 BRI 可显著降低这些国家的贫困率。政策效果存在时间滞后,但长期来看,减贫效果更加显著。BRI 对中国邻国和中低收入国家减贫影响显著。BRI 明显降低了贫困率。从影响机制来看, BRI 不仅通过促进贸易、增强金融和信贷体系、增加中国绿地投资、建立数字基础设施等来促进其减贫,还通过增加双边互访交流和技术支持来帮助其减贫。BRI 通过多方面的合作优先事项为参与国提供了发展机会,助推全球贫困治理取得新进

^① 李向阳(2023):“经济走廊建设:‘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0期,第2-15页。

^② 罗长远、李铮、智艳(2023):“‘走出去’是否有助于抑制企业的‘脱实向虚’行为?——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准自然实验的证据”,《经济学(季刊)》,第6期,第2371-2385页。

^③ 李敬子、高重阳、何祚宇(2023):“新发展格局下产业链安全构建路径探索——基于供需风险分散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第12期,第24-40页。

^④ Bharti, M. S. (2023).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Impact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Ethiopia. *East Asia*, 40, 175-194.

^⑤ Xie, N.; Chen, A.; Wang, X. and Zhang, X. (2023). Does the BRI Contribute to Poverty Reduction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 Did-Based Empirical Test.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10(1), 872.

展。Xiao 等（2023）^①采用双重差分法（DID）研究了“一带一路”倡议是否促进中国与参与国之间的国际创新合作，结果发现，BRI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与参与国之间的创新合作，特别是在经济基础较好的国家。BRI显著增加了合作专利在中国总专利中的比例，但对参与国总专利中合作专利的比例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的机制分析显示，缩短制度距离、加强科技人才交流和激发文化差异是促进创新合作的重要机制。该研究的不足是没有评估在逆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背景下，BRI在长期对创新合作的影响。

（二）影响机制

有学者研究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基础设施项目环境治理的影响。Chen（2023）^②发现，BRI可能对发展金融的规范和标准产生重大影响，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影响相对有限。市场变得更加集中而非竞争加剧。亚洲开发银行的标准并未受到影响，但世界银行可能受到负面影响，并降低其项目级别的环境保障措施。该研究的不足在于，其虽使用定量研究，但可能仍难以完全确定因果关系。周茂等（2023）^③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互联互通效应研究发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显著增强了沿线国家之间互联互通的程度，推动了沿线国家之间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互联互通网络的构建，倡议实施后的“五通”网络规模持续扩大、网络密度不断提高、节点联系更加紧密，且沿线国家联通网络中的中国“桥梁”作用明显。同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互联互通效应具有异质性，如海上丝绸之路国家之间相较于陆上丝绸之路国家之间，除民心相通以外的其他联通效应均更加突出；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间，政策沟通和金融通效应更突出，而收入差距较小的国家之间，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的效应更突出；与中国综合距离临近国家之间相较于非临近国家之间，除政策沟通以外的其他联通效应均更加突出。基于此，建议夯实重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架构，进一步巩固“硬联通”在互联互通中的基石作用。深化规则标准“软联通”，更好发挥对基础设施“硬联通”的体制和机制保障作用。因地制宜建立差异化的对接模式，更大程度地提升互联互通的效能。

共建“一带一路”是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的重要举措，旨在跨越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为各国提供互惠共赢、共享发展的合作机遇。张辉等（2023）^④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形成的贸易合作网络显著促进了各国贸易出口。从理论机制看，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降低各国的生产成本和提升各国的产品需求引致。随着各国出口行为的转变，“一带一路”网络内部的贸易联系显著增强，各国分工模式趋于专精化，协调互补的合作模式提升了“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活力，“一带一路”共谋发展、成果共享的初心使命得以实现。还有学者研究了专利审查高速路协定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技术布局的影响，韩剑等（2023）^⑤研究发现，专利审查高速路对中国向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技术出海”的促进作用更强，对于向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一带

^① Xiao, W.; Xue, Q. and Yi, X. (2023). Do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mote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Cooperation?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10(1), 880.

^② Chen, Ian Tsung-yen. (2023). China's Economic Initiatives and Their Impact o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of Global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14(1), 1-27.

^③ 周茂、武家辉、李雨浓、李丁（2023）：“共建‘一带一路’与互联互通深化——基于沿线国家间的视角”，《管理世界》，第11期，第1-20页。

^④ 张辉、闫强明、李宁静（2023）：“‘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国际贸易的共享效应分析”，《经济研究》，第5期，第4-21页。

^⑤ 韩剑、王星媛、张中意（2023）：“专利审查高速路与中国‘技术出海’——基于谷歌专利云数据的分析”，《管理世界》，第4期，第47-62页。

一路”国家的促进作用较弱。尽管如此，这类市场多具有更广的未来发掘空间，技术竞争压力也相对较小，这不仅有助于促进技术竞争优势的形成，也有助于中国在同其开展专利审查合作中掌握更多国际话语权。

（三）学理性阐释

有学者研究了“一带一路”倡议在推动我国对外开放理论创新发展方面的重要贡献。王璐（2023）^①认为，习近平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对新时代经济发展实践进行理论概括，在统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国际和国内的关系等方面产生许多重大理论成果。特别是在对外开放领域，其主要贡献表现为：面对日益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依然是主流趋势，要打造开放型经济。“一带一路”要打造合作之路、健康之路、复苏之路、增长之路，加强绿色经济合作。在科技领域要深度合作，让人类创造的先进科技成果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管理思想与做法。结合国际治理中体现出的包容性、代表性不足的问题，要为全球治理改革贡献力量，增强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性，体现出公平性。开放必定要承受风险，在开放程度不断提升的当下，安全问题要引起足够重视，要在防控风险、监督管理、国际竞争等方面增强能力。这些都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徐秀军（2023）^②提出协商-实现-分配模式各环节有机衔接和协同推进的全过程合作体系。其中，协商是合作的基础，也是贯通各个环节的重要纽带；实现是合作的主体，也是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部分；分配是合作的归宿，也是合作的动力之源。与此同时，协商-实现-分配模式各环节内部也是各个要素有机联系的子体系。从共建“一带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及其实践来看，全过程合作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鲜明标识。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指引下，共建“一带一路”创造了双边协调的多边主义模式，发挥了优势互补的协同效应，促进了互利共赢的分配正义。

有学者基于正确义利观理念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及其在参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共建中的作用。刘乐（2023）^③结合正确义利观的理念和共建“一带一路”的宗旨，提出一个由动力机制和构成内容所组成的“一带一路”企业社会责任分析框架，其将动力机制分为规范机制和奖惩机制，构成内容涵盖公司治理、经济、社会和环境四个维度以及九个相关议题，并结合中国路桥在蒙内铁路建设过程中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成功案例，总结提炼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应注重的五个方面，包括确保企业履责的可持续性，寻求企业履责的多方联动，做好企业履责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平衡，实现企业履责意识、行动与传播的有机统一，促进企业履责的精细化发展，以为中国企业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借鉴。另有学者从关系性合作的视角分析了中国与东盟的共建“一带一路”的理论逻辑。袁正清、董贺（2023）认为，关系因素建构了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基础和条件。在中国-东盟关系网络的复合结构下，中国与东盟在各领域的关系水平决定了双方合作的空间，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关系网络中的不同位置也决定了合作条件的差异性。基于关系性合作的逻辑，关系既是理念交互的基础，也为理念的交互过程所建构，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基础使双方得以在理念层面相互融合。基于东盟地区合作的本土理念以及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理念建立起深厚的共识，共同推

^① 王璐（2023）：“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贡献和世界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第8期，第108-119页。

^② 徐秀军（2023）：“全过程合作学理阐释与‘一带一路’实践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第9期，第2-26页。

^③ 刘乐（2023）：“企业社会责任与‘一带一路’建设”，《当代亚太》，第5期，第35-70页。

动了“一带一路”合作的具体实践。基于此，应进一步强化中国-东盟关系的韧性与弹性，提升双方关系水平，巩固理念共识，完善合作模式，使“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中国-东盟关系性合作的持久动力。

还有学者针对国际社会某些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质疑进行澄清和驳斥。罗皓文（2023）^①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在提出背景、理念、具体经济交往内容与形式以及最终目的上存在根本性不同，“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一带一路”在发展实践中不但没有制造和加重沿线国家的债务危机，反而对许多沿线国家降低债务、化解债务风险和危机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不是为了挑战现有国际秩序，而是要通过“共商、共建、共享”促进各国经济的共同发展和繁荣，最终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无独有偶。李光勤等（2023）^②选取2000-2018年120个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后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经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亚洲国家及亚欧之外的国家、低收入及高收入国家的国家创新能力受“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更为明显；“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影响沿线国家经济规模和政府治理能力，进而影响其国家创新能力。这有力地驳斥“中国威胁论”。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使各国成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一带一路”倡议则使各国联系更加紧密，这不仅有利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而且有助于更好地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同时，逆全球化倾向显著抬头，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愈演愈烈，世界经贸环境发生明显变化，国际环境不稳定性增大，全球治理赤字日益突出，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的根源。国内外相关研究分别从多边主义与国际法治、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气候变化、粮食与安全等领域，深入分析了如何更好地完善全球治理，以及中国在推动全球治理完善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一）全球治理赤字日益突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全球视角对当今人类所处历史方位做了精准概述：“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全球问题是指影响范围囊括全人类同时也只有世界各国协商合作方能解决的问题，各国协商合作形成集体行动便是全球治理，具体表现为各国就如何处理全球问题而达成的具有自我约束性的规则或制度集合。张宇燕（2023）^③认为，全球治理作为规则集合可以是非中性的，国家间博弈往往会演化为各自努力将全球规则作为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的保障或途径。更进一步说，在做大做强自身的同时打压主要竞争对手便会成为一种“理性的”策略选择。在一个主要由主权国家构成的世界里，难以找到一只将各国利益整合成全人类利益的“全球无形之手”，是全球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也是治理赤字加重的主要原因。

^① 罗皓文（2023）：“对国际社会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三种质疑的澄清”，《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6期，第20-27页。

^② 李光勤、储梦君、牛雯琦（2023）：“‘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创新能力：基于双重差分法的检验”，《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2期，第113-131页。

^③ 张宇燕（2023）：“世界之变与全球经济政治学”，《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期，第1页。

规避国际制度冲突并塑造国际制度间的融合日益成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核心议题。任琳、张尊月（2023）^①研究发现，国际制度主导国与对象国之间存在的所谓“志同道合”盟友关系并不是实现国际制度融合的前提，霸权国与其盟友主导的国际制度并不必然处于高度融合的状态。与之相对，霸权国与新兴大国主导的国际制度之间也并不必然存在冲突和不一致，异质性强的国家间也能在某些方面进行合作，推动实现国际制度融合。在特殊情境下，因在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之外区域逻辑也能促进或阻滞国际制度的融合，新兴大国主导的国际制度甚至比霸权国的盟友主导的国际制度更能与既有的国际多边制度实现融合。在货币金融议题领域，从区域化到全球化的整合方式有望成为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可选路径。

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经济和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主要的风险点包括发达国家高利率抑制通胀和债务高企存在逻辑冲突、大宗商品市场剧烈波动助推世界动荡变革、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大国政治和经济领域斗争的融汇点、地区安全危机对世界局势产生消极影响。妨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深层原因则来自于全球发展不平衡、全球治理缺位、国际安全呈现结构性紧张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既包括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全球发展新主张，也包括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提出的全球安全新倡议，反映了中国在应对全球“四大赤字”上的新理念和新举措（欧阳向英，2023^②）。“两大倡议”对各国探索更科学、更文明的发展道路，对执政党探索一般社会发展规律，对人类的和平与幸福必将作出更大贡献，从而彰显更重大、更深远的世界意义。

（二）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是满足人类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历史演进的必然规律和不可逆转的时代大势。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疫情使这一大变局加速演进，同时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吴志成（2023）^③认为，中国彰显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担当，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创造了中国经济与世界发展相互促进的伟大成就，成为全球经贸合作的积极参与者、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坚定支持者、全球贸易便利化的重要引领者和全球经贸合作平台的改革贡献者，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不断向前发展。

廖凡（2023）^④从多边主义与国际法治互动视角研究了完善全球治理的路径后认为，国际法国际社会通用的话语体系，多边主义是对这种通用性的有力支撑。多边主义不仅是一种行为模式和制度安排，也是一种治理理念和价值追求；不仅是全球治理的手段，也是全球治理的目的。应当以真正的多边主义指引国际法治，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开放性多边体系，捍卫国际法的权威性和统一性，在协商合作基础上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制度性公共产品，通过改革和完善全球治

^① 任琳、张尊月（2023）：“国际制度融合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0期，第77-103页。

^② 欧阳向英（2023）：“‘两大倡议’与中国全球治理新主张”，《欧亚经济》，第2期，第14-24页。

^③ 吴志成（2023）：“经济全球化演进的历史逻辑与中国的担当作为”，《世界经济与政治》，第6期，第2-22页。

^④ 廖凡（2023）：“多边主义与国际法治”，《中国社会科学》，第8期，第60-79页。

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张发林等（2023）^①梳理了不同类型的跨领域规则互动如何对不同维度的治理有效性产生影响，根据不同领域规则对同一议题的目标一致性和内容一致性程度，跨领域规则互动可分为协同型、协商型、竞争型和冲突型四类。其中，协同型互动是构建全球治理有机体系、提升全球治理有效性的最佳规则互动方式，协商型、竞争型和冲突型互动对全球治理有效性的正面作用总体上依次减弱；协同型跨领域规则互动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并不多见，竞争型和冲突型互动较为普遍。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提升全球治理有效性的一条重要路径，即构建跨领域协同互动的全球治理规则体系。据此，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有效变革，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应积极推动构建跨领域协同型互动的全球治理规则体系，不同问题领域的核心规则之间应就特定议题进行横向有效整合，尝试确立针对特定议题的共识性长期发展目标，并建立相互支持的原则和具体策略。以某一议题为核心，充分考虑与之密切相关领域的治理规则，构建基于特定议题的协同型规则互动体系，将是提升全球治理有效性的一个重要方向。Reinsberg 和 Westerwinter（2023）^②研究了全球治理中日益密集的机构重叠网络如何影响政府间组织（IGOs）的设计后发现，机构重叠可以引发模仿动态，即国家在设计新的 IGOs 时会参考在相似问题领域和治理任务上表现相似的现有组织的设计模板。回归结果显示，新的 IGOs 的设计在整个数据覆盖期间（1815-2014 年）与现有 IGOs 的设计呈现出收敛趋势。新旧 IGOs 之间的重叠与它们的设计相似性相关。该研究为机构设计、制度复杂性和全球治理的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并且与现有的制度设计理论相辅相成。这对理解全球治理中机构设计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提供了新的视角，并凸显了机构环境对组织设计的重要性。但同时，该研究并未深入探讨政策制定的具体含义，尤其是在如何优化全球治理结构和提高机构效能方面，尚有进一步的改进空间。

有学者研究了人工智能对全球经济治理秩序的冲击以及数字经济治理的应对等。技术“奇点”的存在使得人工智能将对全球经济运行及其治理模式带来深刻影响。韩永辉等（2023）^③认为，人工智能具有自主学习能力、低应用知识门槛和强大的推理能力等技术特征，其在经济领域转化为可开发层面的“马太效应”、应用层面的“多中心化”和效用层面的“效率最大化”。人工智能基于其“技术-经济”特征将对全球经济治理秩序带来显著冲击，主要表现为大国利益分配争夺激化，“中心-外围”格局失衡加剧；主权国家主体地位遭到削弱，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力进一步增强；工具理性收益超越价值理性，机制设置面临人机冲突。为了应对人工智能对全球经济治理秩序的冲击，应以智能技术赋能新型经济全球化，塑造公正的利益分配格局；推动形成多元协同的权力结构，适应“多中心化”治理模式；以预防性和可被解释为原则，强化监管人工智能参与机制设置。总之，应以“技术向善”为治理目标，以“多边协作”为治理手段，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补充人”作用，审慎运用其“取代人”功能，绝不允许其在社会经济决策中扮演“超越人”角色。数字经济治理的关键在于平衡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郎平、郎昆（2023）^④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视角出发将数字经济治理分为

^① 张发林、靳天熙、吴笛（2023）：“跨领域规则互动与全球治理有效性”，《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0期，第44-76页。

^② Reinsberg, B. & Westerwinter, O. (2023). Institutional Overlap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Design of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8, 693-724.

^③ 韩永辉、张帆、彭嘉成（2023）：“秩序重构：人工智能冲击下的全球经济治理”，《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期，第121-149页。

^④ 郎平、郎昆（2023）：“统筹发展和安全视野下的数字经济治理绩效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第8期，第87-108页。

基准情景、依附型合作、大国竞争和共享共治四种情景后研究发现，基准情景下国家对数字安全的投入应当止于均衡安全水平；依附型合作情景会形成“中心-外围”的数字霸权体系进而固化并加剧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平等；大国竞争情景治理模式容易导致相关国家陷入“数字安全竞赛”困境；共享共治情景有助于实现总福利最大化的目标。数字经济治理中的欧盟数字经济治理模式、美日数字经济合作模式和中美数字竞争模式均会带来一定福利损失，而中国提出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倡议则可充分发挥技术、数据和安全的公共产品属性，通过协调各国利益和促进各方合作，在全球层面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动态平衡。

另有学者研究了全球气候治理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徐沁仪（2023）^①构建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韧性评估框架，从治理基础（物质性动力和规范化压力）、治理目标（宏观目标和关联目标）、治理方式（执行与主要行为体当前的互动进程）三个维度对《巴黎协定》下全球气候治理的治理韧性进行分析后认为，当前，全球气候治理的发展呈现总体稳定，短期波动与不确定性增加的综合态势。虽然动荡的国际形势导致《巴黎协定》执行力度出现波动，但目前尚未对其治理韧性造成实质性挑战。现阶段的风险点主要集中在如何确保公平与分配，促进减排目标的实现以及处理大国和分散的小集团关系等方面。这需要主要国家对其发展进行引导，以期它能够趋向可预期的变化形式，以维持和推动全球气候行动。这就需要主要国家坚持多边主导导向的谈判与合作，团结多元主体，完善国内或国际层面法规，协调气候治理与贸易、能源和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关系，以在国际格局变革和大国竞争加剧的形势下促进关乎全球利益的气候行动。

还有学者对全球粮食领域安全及中国参与治理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联合国粮农组织致力于发挥比较优势，在“大农业”框架下搭建了以规范性工作和实地项目为支柱的粮食安全治理体系。作为其关键供资国的中国、美国、德国、巴西在供资渠道与定位、规范性参与和实地项目合作方面表现出较大差异，这缘于其不同的发展阶段、外交战略和治国理政经验。胡王云（2023）^②认为，在实地项目合作中，中国更多关注生产能力建设、需求导向、一国一模式以及共同实践、互利共赢，这使中国-粮农组织信托基金产生了较好实效。相较其他三国，中国在粮农组织规范性工作方面的参与和影响较少，在利用和创新系统性解决方案、塑造单一项目的持续性影响方面相对薄弱。在粮农组织有意减轻南南合作对中国资金依赖的背景下，总结经验，做好最佳实践和标准建设，共享知识，塑造系统性解决方案，或是中国进一步夯实和拓展合作空间的可选项。

六、和平发展与国家安全

当今国际形势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总体和平与局部冲突、总体稳定与局部动荡，冲突与动荡有显著增多之势，共存与安全的问题已被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破解和平赤字与发展赤字的任务变得更加紧迫。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将继续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伟业，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走深走实，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一）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① 徐沁仪（2023）：“危机、韧性与风险：〈巴黎协定〉下的全球气候治理”，《国际政治研究》，第5期，第62-82页。

^② 胡王云（2023）：“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粮食安全治理与中国参与——基于关键供资国参与路径的比较分析”，《国际政治研究》，第5期，第28-61页。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博弈加剧，南北矛盾进一步扩大，地区动荡与局部冲突不断，全球性风险与挑战日益复杂严峻，破解和平赤字与发展赤字的任务变得更加紧迫。吴志成（2023）^①认为，中国基于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人类根本利益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出发成功走出了一条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这是中国对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主题的积极回应，也是对人类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性创造。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将继续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伟业，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走深走实，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当今国际形势的主要特征是总体和平、局部冲突，总体稳定、局部动荡，冲突与动荡有显著增多之势，共存与安全的问题已经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面对频发的“逆时代主题事件”，陈培永、李颖（2023）^②认为，一方面，不能因此就动摇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判断，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其虽是少数和支流，却存在不断放大的可能，若任其发生“量的累积”“质的飞跃”，就有可能影响到时代主题的变化方向。捍卫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应该在把和平与发展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弘扬的基础上，防止局部冲突向世界战争演变，防止发展长期停滞，树立不得不加入战争的底线思维。

全球安全倡议旨在消弭国际冲突根源、完善全球安全治理，协调国际社会共同应对百年未有大变局加速演进下面临的新挑战。冷雪昊、冯维江（2023）^③从有机权力理论和新时代国家安全学的视角探讨了全球安全倡议的性质和产生作用的机制，分析了全球安全倡议如何影响国家的权力结构和安全策略，其评估了拉美地区的国家安全形势和需求，探讨了在该地区实践全球安全倡议的可能路径和前景，分析了拉美国家在全球安全倡议框架下合作的潜力以及利用这一框架来加强区域安全的着力点。研究发现，尽管全球安全倡议可以在理念、制度、器物等层面为拉美地区国家安全问题的解决提供助益，但这些问题的根本性解决，还需各国协同投入资源。只有经过共同努力，拉美地区才能实现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和共同繁荣。

杨攻研等（2023）^④研究发现，贸易失衡的加剧会使贸易伙伴之间军事冲突爆发的可能性显著增加，且逆差国更有可能成为冲突的发起者。就国内层面而言，逆差国的政治周期和经济周期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执政者面临更大的国内政治竞争、本国就业形势不断恶化时，贸易赤字往往成为冲突的触发器；国际层面，国家间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文化观念等因素差异并非问题的根源，而顺差国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与逆差国背道而驰的外交政策尤其是科技领域的赶超使得失衡双方的矛盾不断加剧，以失衡为特征的国际贸易不再被认为是“双赢”并最终推动贸易伙伴走向了军事对抗。此外，当两国存在历史仇恨或地理相邻时，贸易失衡的边际效应显著提升。当存在超级大国且该国为贸易失衡的逆差方时，军事冲突爆发的风险也更大，即使签订自贸协定甚至联盟亦不能有效抑制贸易失衡的影响。同时，相比更加激烈的战争，中低级别冲突发生的概率更高；而贸易失衡所

^① 吴志成（2023）：“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0期，第81-93页。

^② 陈培永、李颖（2023）：“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再思考”，《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第11期，第79-86页。

^③ 冷雪昊、冯维江（2023）：“全球安全倡议的性质及其在拉美的实践前景”，《拉丁美洲研究》，第5期，第27-45页。

^④ 杨攻研、张明、张慧敏（2023）：“危险的失衡：贸易失衡的国际冲突效应及作用机制”，《当代亚太》，第1期，第4-44页。

诱发的军事行动更多的是以改变目标国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推翻执政当局为目的。杨正一（2023）^①通过对中美欧制造业细分行业产业贡献度和 GVC 地位指数的测算发现，不对称相互依存劣势和全球供应链地位受到挑战的安全负外部性以及竞争对手的身份判定，促使美欧对华供应链策略由市场逻辑转变为安全逻辑。欧盟对华战略认知的对抗性低于美国，决定了欧盟的对华供应链策略较美国温和。美欧之间尽管存在较大的安全负外部性，但战略认知的盟友属性使美国对欧盟选择了低安全化水平的供应链策略。中国对美国供应链合作的安全负外部性较低，主要表现为供应链脆弱性问题，加之双方战略认知敌对性的增强，防御型供应链策略成为适合当前中国的最优解。

（二）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

当前，全球化出现了由经济全球化转向安全全球化的趋势，并出现堕入“全球安全困境”的迹象。一些国家的政策开始由倾向于通过经济全球化带动增长转向更多考虑国家安全因素并宁可为此牺牲经济效率，表现出更不相信开放、更不相信市场、战略竞争加码、供应链及支付网络安全化、军事投入及部署增加等特征。阎学通（2023）^②认为，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使得安全概念严重泛化和政治化，即把各个领域的事务都视为安全问题，把非政治领域的事务当作政治问题处理。目前，安全概念泛化和政治化的最突出现象是经济安全极大程度地影响着大国的对外决策，从而影响全球的国际关系。大国的决策者们担心国际合作形成的相互依赖成为对方制约自己的战略手段，于是采取减少国际经济合作或缩短国际产业链的方法增强经济安全，即去全球化的政策。当多数大国采取去全球化的政策，就形成了逆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冯维江（2023）^③认为，拯救全球化的根本之道在于通过突破性创新驱动的技术进步，将趋于疲弱的世界经济扭转至相对高速增长的增长轨道，让各国由“存量博弈”回归“增量博弈”。边疆或边缘地区具有打破常规、爆发出制度及科技等方面突破性创新的有利条件，但也存在特有的脆弱性。对一国而言，除应针对边疆地区出台大兴创新之风的鼓励政策外，还应当加强对其所承受的硬权力及软权力影响情况的监测和研判，在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同时，须臾不可放松在软权力上的引致性投资，增强边疆地区的向心力，为其富有活力的突破性创新潜力的发挥创造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秦立志（2023）^④研究了战略不确定性影响安全困境的因果机制，其将战略不确定性作为自变量，主要聚焦于战略对手互动环境的不确定性特征，将威胁预期作为中间变量，安全困境则是因变量。衡量互动环境不确定性程度的指标分别是权力中心的数量及其地理分布、权力转移、大国战略行动。威胁预期主要由互动双方战略目标的相容程度、威胁紧迫性和威胁反馈模式构成。威胁预期分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取向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取向，并通过因果漏斗、回音壁效应和镜像反应三个传导机制可能会产生夸大威胁的效果。据此，只要国际体系尚未被康德文化主导，管控安全困境烈度的现实选择就是构建战略稳定机制。

有学者从基本概念或方法论入手，尝试对国家安全理论进行构建，或对总体国家安全观进行阐释。刘跃进（2023）^⑤研究了国家安全学理论中的概念及其存

^① 杨正一（2023）：“大国竞争时代供应链调整的行为逻辑：安全外部性与战略认知的解释”，《当代亚太》，第5期，第71-99页。

^② 阎学通（2023）：“世界已经掉头”，《国际政治科学》，第2期，第III-VI页。

^③ 冯维江（2023）：“安全全球化的经济逻辑：以全球安全困境为例国际安全研究”，《国际安全研究》，第1期，第50-74页。

^④ 秦立志（2023）：“战略不确定性与安全困境的生成机制”，《国际政治科学》，第2期，第61-101页。

^⑤ 刘跃进（2023）：“国家安全学理论中概念及其定义的几个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在问题,其既包括不能准确区分概念内涵、外延的问题,也包括分不清定义中“是的”“好的”与“相关的”几种情况的问题,还有混淆语词解释、事实陈述和概念定义的情况,以及不合理引用政策文本与法律条款中相关定义作为标准的问题。为此,要准确定义国家安全领域的各种概念,就必须严格区分这些不同情况,掌握逻辑学关于概念的理论以及关于概念定义的方法,科学、准确、合乎逻辑地定义各种概念,为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祁昊天(2023)^①基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础上实现从学理层面对国家安全总体性和安全领域多维、多元、多尺度集成的阐释。其认为,国家安全学的学理建构需要兼顾宏观体系化与微观精细化的要求,国家安全理论和学科探讨的复杂系统转向已具备从自发向自觉、从零散向体系的基础和条件。推动国家安全学科的系统化学理探索也拥有跨学科系统路径研究的对标、参照和借鉴可能。从复杂自适应系统的角度理解国家安全有助于在充分承认不同领域特性和细化其关联方式的基础上实现局部与整体安全的动态平衡,并避免必要干预的缺失与追求绝对安全这两种极端。必要干预是在开放系统中降低安全环境失序风险的前提,也是避免机械论与还原论对国家安全总体性产生破坏的基础。强调效率与适应性的平衡,避免控制与安全的绝对化,则是统筹国家安全、尊重其涌现特征并加强总体韧性的保障。

七、小结

本文通过梳理2023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发现,这些研究极大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架构及学科体系建设,对推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总体而言,相关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重点议题突出。相关研究主要涵盖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发展与实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和平发展与国家安全等方面,紧扣习近平外交思想重要议题和关键领域,既有学理性阐释也有创新性发展,均属于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研究范畴。

二是方法交叉运用。这些文章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等学科交叉理论,综合运用归纳演绎、计量模型、数据分析等对当代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等重大议题进行研究。

三是创新与贡献明显。一方面,创新发展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有学者提出以“一题五观”来构建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学科框架,该框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浓厚的学术性和高度的集成性,基本涵盖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领域,是对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创新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体现了理念与工具的创新。有学者将理论模型和经验分析相结合,运用计量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等相关理论研究当代国际重大问题。

四是结论客观公允。首先,习近平外交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为推进新时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注入了强大动力。其次,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实践成效显著,而且助推理论层面研究。从实践成效看,“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改善全球基础设施项目环境治理,有助于沿线国家减贫,有利于促进中国与参与国之间的国际创新合作,对参与国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具有正向影响。从理论层面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对推动我国对外开放理论创新发展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如,全过程合作已成为共建“一带

学报》,第4期,第29-40页。

^① 祁昊天(2023):“国家安全系统理论刍议”,《国际政治研究》,第1期,第63-88页。

一路”的鲜明标识。正确义利观理念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及其在参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共建中发挥的积极作用等。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对现存共同体秩序的超越，向全球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全球治理思维和治理理念，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开辟了新的愿景。

综上，这些研究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有力推进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研究广度与深度。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例如，研究专题单一，难以体现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系统性；多数文献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特别是对数理工具的熟练使用还有待加强；研究视角和深度有待提升，从当前能刊发在重要期刊上的文章选题来看，尚难以充分体现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丰富内涵等。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进一步细化和深化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学理性研究或政策性阐释，或是学界未来努力的方向。

（执笔人：贾中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室）